

20世纪三次民族主义浪潮评析

郝时远

20世纪人类社会的民族过程,出现过三次重大的全球性民族主义浪潮。它们分别发生于一战、二战和冷战结束前后,也就是说,是伴随着世界政治格局的重大变化而出现的。本世纪以来的这两场“热战”和一场“冷战”,如果不去涉及世界各国人民反法西斯斗争的伟大胜利和历史意义,仅就其起因和所构建的体制而言,都是帝国强权角逐、争霸的结果。这种帝国强权体制的转换和瓦解过程中兴起的民族主义运动,从总体上说也都是以反抗帝国霸权为政治背景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民族主义运动的广泛兴起,是帝国霸权衰落的必然结果。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古代帝国衰亡的论断——“民族主义导致了罗马和希腊的灭亡”^①——仍是具有现实意义的。

一、第一次民族主义浪潮

进入20世纪的欧洲,国家的政治格局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近代以来的西欧资产阶级革命和民族国家的建立,对欧洲传统帝国形成了猛烈的冲击。中、东欧地区的奥匈帝国,沙俄帝国和奥斯曼帝国等传统帝国,不仅面临着西欧新兴强国重新瓜分世界的严峻挑战,而且面对着其帝国范围内各被压迫民族争取解放的强烈反抗。“这些帝国组织的最初的缺口是由土耳其人的巴尔干臣民打开的。”^②1912年爆发的第一次巴尔干战争,使巴尔干地区各民族长期反抗奥斯曼帝国奴役统治的斗争取得彻底胜利。但是,由于长期的帝国专制和残酷的民族压迫,使巴尔干各民族谋求解放的斗争和建立独立国家的热望,既有反抗土耳其势力的联合,又有各民族之间为建立大民族国家的争夺。奥斯曼帝国在巴尔干各民族之间挑拨离间所埋下的仇怨种子,在民族主义的土壤中萌发出了枝叶,使巴尔干各民族在反抗外来压迫的同时纷纷谋求建立大民族国家。这种愿望与他们各自历史上曾有过的辉煌帝国背景相联系,提出了种种重建帝国和再现帝国版图的大民族国家计划。如大塞尔维亚计划,其最高要求是将杜尚皇朝时期所有的疆土一概纳入其版图;大希腊计划,要填补前拜占庭帝国的全部真空地带。此外,还有大保加利亚计划、大罗马尼亚计划、大黑山计划、大阿尔巴尼亚计划、大克罗地亚计划等。^③1913年的第二次巴尔干战争即是巴尔干一些民族为实现上述建国计划而瓜分马其顿的争夺。

① 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载《马克思、恩格斯论民族问题》上册,民族出版社,1987年,第46页。

② 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第357页。

③ 参见兰科·佩特科维奇:《巴尔干既非“火药桶”又非“和平区”》,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6页。

巴尔干半岛民族主义运动的兴起,特别是各民族统治阶级图谋建立大民族国家的利益冲突,为欧洲两大帝国集团争夺巴尔干半岛的角逐提供了渗透、介入的缺口。利用巴尔干各民族在奥斯曼帝国统治、瓜分、奴役下所造成的民族仇怨,鼓励某些大民族主义的扩张愿望,也成为沙俄和奥匈帝国直接染指巴尔干的出发点。在帝国集团的争夺下,巴尔干半岛的民族解放运动渗透了大民族主义的毒素和民族复仇的心理。巴尔干半岛各民族之间关系的复杂性和冲突的多发性,使这一地区再次扮演了欧洲“火药桶”的角色。1914年6月,奥匈帝国王室的大公在萨拉热窝被塞尔维亚爱国者刺杀,这一事件成为引发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直接导火索。

一战是欧洲列强重新瓜分世界的战争。战争危机促进了无产阶级革命高潮的到来。1917年俄国爆发了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俄国首先退出了战争。作为“各民族人民监狱”的沙俄帝国,其彻底覆灭的过程是在俄国无产阶级革命力量与资产阶级和沙俄旧势力的较量以及各非俄罗斯民族争取解放的民族自决斗争相交织的形势下完成的。1918~1920年间,在原沙俄帝国的版图上出现了近70个共和国或独立政权,其中除资产阶级和沙俄旧势力负隅顽抗的政权外,大都是以民族为依托并且有过独立国家历史的政权。它们既有苏维埃共和国,又有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和传统汗国。从这个意义上说,沙俄数百年对外侵略扩张所造就的庞大帝国由此瓦解。在列宁倡导的各民族无产阶级的民族自决原则鼓舞下,随着俄国国内革命形势的发展,第一个社会主义多民族国家——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于1922年底正式建立。

一战以德奥同盟的失败而告结束,奥匈帝国随之解体。在中、东欧地区长期被帝国势力瓜分统治的领土上,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出现了一批民族国家,如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奥地利、匈牙利、南斯拉夫、芬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等。但是,新列强的战后分赃和“凡尔赛体制”的构建,不仅没有给这些新独立国家留下自主发展的空间,而且使种族、民族、宗教集团的人为肢解和领土分割为这些国家之间的关系、国内民族关系留下了许多祸患。战后的中、东欧地区,有1680多万人成为脱离民族母体而置于其他民族为主体的国家统治之下的少数民族。^①这些新建国家无法摆脱帝国意识的影响,资产阶级大民族主义的膨胀、民族复仇主义的强化、领土纠纷的隐患,使其在战后的发展中都走上了国王专制和法西斯统治的道路。也正因为如此,一战前后以中、东欧地区为主的民族主义运动,其反抗帝国统治和民族压迫的积极作用,受到战后欧洲政治格局、新独立国家政治取向的制约和抵消。

但是,一战前后东方民族主义思潮的兴起,则代表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在民族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反殖、反帝的进步思想,体现了争取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的自决原则。中国孙中山三民主义的民族主义思想,是当时东方民族主义思潮中最有影响力的理论。此外,印度的甘地主义、土耳其的凯末尔主义、阿富汗的塔尔奇民族主义、中东伊斯兰改革主义和早期的阿拉伯民族主义等,都构成20世纪初期东方民族主义运动兴起的精神动力。^②一战的结束和苏联的建立,使东方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主义运动增加了新的推动力。民族解放运动与无产阶级革命相促发、相兼容而产生的历史合力,成为摧毁世界殖民主义体系的巨大力量。

二、第二次民族主义浪潮

^① 参见蒋孟引:《第一次世界大战》,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47页。

^② 参见彭树智:《东方民族主义思潮》,西北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24页。

一战后出现的“凡尔赛体制”并未实现欧洲乃至世界的安宁。英、法等列强维持均势的企图，一方面受到以东方民族主义思潮为代表的日益勃兴的海外殖民地国家民族解放运动的现实挑战；另一方面又受到日本在东方、意大利在欧洲和北非的扩张以及德意志大日耳曼民族复仇主义的潜在威胁。同时，各帝国主义国家对苏联的出现和科学社会主义思想日益广泛的传播十分恐惧，对苏联的围困使东、西方意识形态的分野也随之清晰化。

30年代初的经济大萧条，使欧、美资本主义国家陷入了内外交困的危机。在这场危机中，德国恢复列强地位野心、意大利对战后分赃不均的不满、日本图谋称霸亚洲的取向，都在极端民族主义的社会氛围中恶性膨胀，要求“生存空间”的扩张叫嚣，奉行“适者生存”的种族原则，使这些国家迅速走上了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道路。

当时，苏联在推进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过程中取得了显著的发展，以至一些西方人也开始相信社会主义必将代替资本主义的时代已经到来。然而，正是在这样一种形势下，苏联的联邦体制发生了重大变化，形成了高度中央集权的领导体制，苏共领导人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也陷入了主观唯意志的盲目状态。这一变化，使联盟宪法赋予各加盟共和国的权利和各自治共和国等自治实体应享有的权利被大幅度削弱，甚至在实际中被取消。由此而引起的非俄罗斯民族的不满情绪和地方民族主义的反应，也在1934年底开始的政治大清洗中受到严酷的整肃。列宁对大俄罗斯民族主义危险的理性认识和他政治遗嘱中要求全党同俄罗斯大国沙文主义决死战的告诫，也从此被束之高阁。以阶级斗争方式对非俄罗斯民族的地方民族主义进行打击，成为苏联处理民族问题的主要政治任务。具有深厚历史传统和广泛社会基础的大俄罗斯民族主义，也因此得到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蔓延、发展的空间。苏联国内大俄罗斯民族主义的回升，相应地影响到其对外政策。苏联在支援国际共运和输出革命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中，开始渗入了大国沙文主义成分。恢复沙俄帝国时期版图的愿望，使苏联领导人在二战前后都超越意识形态地与欧、美列强进行了划分势力范围的交易。例如，德国和苏联瓜分波兰；战争爆发后苏联趁德国对西线作战之机于1940年先后占领了芬兰的卡累利阿等地、波罗的海三国、罗马尼亚的比萨拉比亚地区。在希特勒发动对苏侵略战争前，苏联的西部领土基本上恢复了帝俄时期的版图。又如，在苏联红军的强大战略反攻下，希特勒的第三帝国迅速走向崩溃。1944年10月初丘吉尔与斯大林关于战后势力范围划分的秘密交易，承袭了历史上欧洲秘密外交的帝国传统。苏联不仅遵守了英国对战后希腊实行何种社会制度拥有90%的影响力的承诺^①，而且是以希共领导的人民阵线 and 人民解放军在英军压力下被解除武装为代价的。如果说，苏联恢复帝俄时期的版图是为了扩大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范围，那么放弃对希共领导人民群众建立社会主义国家的武装斗争的支持却是难以理解的。当然，这仅仅是大国决定它国命运的开始。1945年2月4日，罗斯福、斯大林和丘吉尔在克里米亚举行雅尔塔会议。这是战争结束前夕同盟国三巨头勾画欧洲重组蓝图和划分世界势力范围的会议。除东欧地区势力范围的划分已明显反映了东、西方意识形态的分野外，美、苏关于战后中国的协议则表现出传统的帝国强权特征。按照协议，战后美国在中国“起领导作用”，支配蒋介石的国民党政权；承认苏联控制下的外蒙古现状并恢复日俄战争后沙俄帝国丧失的在中国东北享有的权益。中国作为抗日战争的主战场和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的成员，其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被一个帝国主义国家和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瓜分了。不难看出，苏联对外政策中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历史继承性，

^① 参见徐焰等：《走出雅尔塔》，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20页。

在二战以后日益显著地反映出来。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以东方民族主义思潮为代表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在亚、非、拉广泛兴起。这些运动的发生国绝大多数处于帝国主义的压迫、奴役之下,这些国家的民族民主革命也必然地反映了反帝、反封建的时代特征。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沙俄帝国爆发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以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在世界各地广泛传播,极大地推动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在风起云涌的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中,民族民主运动或多或少地受到俄国十月革命和苏联建立的影响。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民族民主革命,从领导力量来看也表现为以下5种类型:一是以中国为代表的、由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其中包括越南、朝鲜的民族民主革命;二是以土耳其为代表的、由民族资产阶级领导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其中包括印度的民族民主运动;三是以尼加拉瓜为代表的、由小资产阶级领导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四是由爱国的封建贵族领导的民族民主运动,如阿富汗和埃塞俄比亚;五是由爱国的部落酋长领导的民族民主运动,如摩洛哥等。^①无论其类型如何,建立独立国家、实现民族解放的目标是其共同选择,其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斗争方向是一致的。这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民族主义浪潮的本质特点。第二次民族主义浪潮对世界政治格局最显著的影响是几乎全面地摧毁了帝国主义的殖民体系,“正如欧洲在19世纪最后的20年中迅速地获得其大部分殖民地那样,欧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同样短的时期内又失去了其大部分殖民地。”^②1944~1968年,亚洲和非洲殖民地、半殖民地实现独立的国家达63个之多,其中40年代12个(不含中国),50年代11个,60年代40个。与此同时,联合国成员国在战后由几十个扩大到100多个,新兴独立国家形成了国际政治、经济舞台上的第三世界力量。此外,民族主义运动的广泛兴起及其反殖、反帝、争取国家独立的斗争,也受到苏联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影响。战后除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外,亚洲的中国、越南、朝鲜等社会主义国家也相继建立。而在亚、非、拉众多的新兴独立国家中也出现了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如印度尼赫鲁的社会主义、印度尼西亚苏加诺的社会主义、缅甸纲领党的社会主义、叙利亚阿拉伯复兴社会党的社会主义、伊拉克阿拉伯复兴社会党的社会主义、加纳恩克鲁玛的社会主义、几内亚民主党的社会主义、坦桑尼亚尼雷尔的社会主义、赞比亚卡翁达的社会主义、马达加斯加的社会主义、马里凯塔的社会主义、塞内加尔桑戈尔的社会主义、刚果劳动党的社会主义、贝宁人民革命党的社会主义、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劳动党的社会主义、莫桑比克解放阵线的社会主义、埃及纳赛尔的社会主义、阿尔及利亚本·贝拉和布迈丁的社会主义、利比亚卡扎菲的社会主义、智利阿连德的社会主义、圭亚那贾根和伯纳姆的社会主义,等等。^③这些社会主义的政治纲领虽然五花八门,但是民族主义的要求却是一致的。

传统殖民帝国的衰败和新兴独立国家的涌现,并不意味着民族主义运动的休止。众多的民族独立国家事实上无法改变其国家内部多民族的社会结构。国内各民族平等相待、和睦共处的问题随着国家独立进程的结束而日益突出。历史上延续下来的民族压迫、殖民统治造成的民族和种族仇怨、帝国主义侵略战争造成的民族隔阂,以及相应的领土、宗教争端等,都需要通过建立一种民族、种族平等的社会保障机制来消除和解决。在这方面,以苏联为代表的一批

① 参见彭树智:《现代民族主义运动史》,西北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3~5页。

② 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第812页。

③ 参见吴治清等:《亚非拉各种社会主义》,求实出版社,1983年。

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根据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基本原理,在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是最有条件正确处理和妥善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并应以其实际成效对世界的民族过程产生积极的影响。

三、第三次民族主义浪潮

冷战结束前后出现的第三次民族主义浪潮发端于前苏联和东欧地区。为什么会如此?为什么这些最有条件正确处理和妥善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社会主义国家,会成为民族主义的“核裂变场”?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能不能解决民族问题?对这一系列问题,的确需要作出严肃的回答。

前苏联和东欧地区,历史上长期处于传统帝国的统治之下,民族关系异常复杂,民族主义的压迫性和抗拒性极为突出。如何清除历史上帝国统治、民族压迫所造就的扩张、征服性的大民族主义和保守、分离性的被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是留给苏联和战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一份沉重的历史遗产。这也是列宁研究民族问题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过程中始终关注的重大问题。列宁在领导十月革命和建立苏联的过程中,无情地抨击了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历史作用和现实危害,提出了克服大俄罗斯民族主义是消除非俄罗斯民族的地方民族主义最有效的手段这一辩证思想,以至于临终前还对全党表明“我宣布同大国沙文主义进行决战”的坚决态度。^①然而,如上文所述,苏联从30年代起,其民族政策的实施在肃反扩大化的阶级斗争氛围中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非俄罗斯民族的地方民族主义被认为是联盟的主要危险,以阶级斗争方式处理民族问题的需要也进一步强化着高度的中央集权体制。卫国战争期间和战后对德军占领地区十多个少数民族实行集体流放的惩罚,对俄罗斯民族在建设苏联、保卫苏联方面伟大功绩的无度渲染,使苏联社会不仅确立了俄罗斯民族是全国“最优秀的民族”和“领导民族”的至高无尚的民族地位,而且也确定了非俄罗斯民族只有“俄罗斯化”才能实现民族平等的唯一途径。

苏共二十大对斯大林的批判,曾一度开启了恢复民族政策、调整民族关系的闸门。被压抑已久的非俄罗斯民族的地方民族主义情绪也得到了施放的机会,要求民族自主权利和恢复加盟共和国应有权利的强烈意愿,使赫鲁晓夫感到了“地方沙文主义”的威胁。在这种形势下,赫鲁晓夫宣布社会主义在苏联已获得完全胜利、并将用20年时间建成共产主义的意义,在解决民族问题方面则意味着苏联已经形成了新的人们历史共同体——苏联人民。“在全面展开共产主义建设的过程中,将使各民族达到完全的一致。”^②因此,“苏联境内各加盟共和国之间的界限愈来愈失去原来的意义”了。^③民族差别的取消,使以民族为依托的加盟共和国失去了存在的意义,非俄罗斯民族要求更多自主权的意愿也在加速“俄罗斯化”的“全民国家”中得到了“实现”。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虽然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进程的估价有所收敛,但是对苏联民族过程的认识则仍表现出激进的乐观。在庆祝苏联建国50年的报告中,勃列日涅夫宣布:“我

① 见列宁:《关于反对大国沙文主义问题给列·波·加米涅夫的便笺》,载《列宁论民族问题》下册,民族出版社,1987年,第862页。

②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关于苏联共产党纲领的报告》,载《苏联民族问题文献选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7年,第250页。

③ 《苏联共产党纲领》,载《苏联民族问题文献选编》,第253页。

们在总结过去半个世纪的英雄业绩时,可以完全有根据这样说:过去遗留给我们的那种状况的民族问题,已经完全解决,已经彻底和一劳永逸地解决了。”^①在这种思想指导下,那种要求“把统一的苏维埃民族这样一个概念写入宪法,取消加盟共和国和自治共和国,或者严格限制加盟共和国的主权,剥夺它们退出苏联的权利和同外界交往的权利”等极端意见^②,公然出现在1977年修改宪法的讨论中,也就不足为奇了。对民族问题的盲目乐观的估计始终伴随着“俄罗斯化”的种种措施,甚至包括对沙俄侵略扩张、奴役非俄罗斯民族的历史进行根本性的修改,进而说明非俄罗斯民族的“俄罗斯化”是历史性的自决选择,他们向往伟大的俄国,为了生存和自由“并入”和“加入”俄国,从而“摆脱了从肉体上被消灭的威胁,开创了民族团结的可能性,为今后的社会经济发展创造了前提,使其接受先进的俄罗斯文化,接受俄国的社会政治思想的民主传统。”^③马克思列宁主义对沙俄帝国是“各民族人民监狱”的历史认定也因此被否定。苏联官方创造历史童话来美化现实的族际关系和证明非俄罗斯民族自愿“俄罗斯化”的举措,促使大俄罗斯民族主义向社会化发展。“苏联就是俄罗斯”的观念,也因此俄罗斯民族中自然植根。在这种观念的熏陶下,甚至连试图对苏联社会的种种弊端进行大刀阔斧改革的戈尔巴乔夫,也在基辅的一次公众集会上脱口而出:“对于正在全力奋斗的全体人民来说,俄罗斯,我的意思是指苏联,我是说——我们今天这样称呼它,事实上它就是苏联——对于全体人民来说,它是一个堡垒。”^④然而,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通俗道理,在戈尔巴乔夫讲这句话之后不久便再次应验。1986年哈萨克加盟共和国首都爆发的民族骚乱揭开了苏联改革过程中的民族问题危机。在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思想的导向下,非俄罗斯民族压抑已久的民族主义如火山爆发般喷射出来。民族主义浪潮政治化、极端化的发展,不论其反苏也好、反共也罢,其深厚的底蕴是对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历史仇怨和现实不满。如果说戈尔巴乔夫的“公开性”所引起的对一切“悲惨事件”的揭露,使苏共陷入了被动承担“历史罪责”的众矢之的的险境,进而从内部分化、瓦解了党的组织和党员的信念,那么非俄罗斯民族对大俄罗斯民族的挑战,却使社会化的大俄罗斯民族主义产生了内聚性的收缩;“最优秀的民族”的社会地位和无与伦比的“伟大贡献”被否定而产生的“吃亏”心理,使俄罗斯民族主义势力在沙俄帝国的国旗、军旗感召下加入了拆散苏维埃联盟的“主权大战”,并进一步刺激了非俄罗斯民族的分裂意识。苏联的崩溃是政治、经济、民族和社会生活多方面危机全面爆发的结果,而摧垮这座近70年的联盟大厦的最终力量是包括俄罗斯民族在内的各民族的民族主义分离运动。1991年,前苏共领导人利加乔夫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演讲时,不无遗憾地指出苏共领导层没有及时看清联盟国家的主要危险是民族主义分立运动,这恐怕也是当事者的由衷之言。

然而,从50年代苏共开始盲目乐观地估计社会主义建设进程和有意识地通过修改历史、美化现实促进民族融合过程时,力求寻找“铁幕”裂隙的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却已嗅出了苏联歌舞升平掩盖着的民族问题危机。“民族主义注定要成为阻止共产主义继续前进的障碍”的判断^⑤、“民族主义的离心力一定会比国际主义思想占上风”的预言^⑥,成为西方敌对势力利用

① 《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五十年》,载《苏联民族问题文献选编》,第343页。

② 《关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宪法草案及其全民讨论结果的报告》,载《苏联民族问题文献选编》,第375页。

③ 《关于庆祝亚美尼亚加入俄国版图一百五十周年的决议》,载《苏联民族问题文献选编》,第384页。

④ 转引自布热津斯基:《竞赛方案》,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8年,第116页。

⑤ 《安德罗波夫言论选集》,世界知识出版社,1984年,第64页。

⑥ 《西方和平演变社会主义国家的战略、策略、手法》,湖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82页。

苏联及其控制的东欧国家内部矛盾的聚焦点之一。70年代,当苏联宣布民族问题已经“完全彻底”、“一劳永逸”地解决了时,西方人却认为苏联所面临的诸多问题中“最急需解决而又最难解决的显然是民族问题”。^①到了80年代,安德罗波夫短暂的执政和改革意向虽然开始意识到民族问题的潜在危机,但是西方势力以苏联多民族特点为缺口、以非俄罗斯民族为重点、以苏联解体为目标的“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图谋也形成了完整的方略。“最好的遏制力量存在于苏联本身”,其中“非俄罗斯人的政治热望乃是苏联的致命弱点”。在外部世界的鼓动下,“非俄罗斯民族的政治民族主义热望会变得更加活跃”^②,所以美国对苏联的宣传、渗透攻势“必须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苏联的非俄罗斯民族上”。^③在东欧国家力图摆脱苏联控制的民族主义愿望和苏联非俄罗斯民族要求分离、独立的民族主义取向的交互作用下,“大俄罗斯帝国的解体也会最终到来”。^④这些预言和图谋,并非反映西方势力的高明和远见,而是苏联由社会主义逐步转变为社会帝国主义或现代俄罗斯帝国的事实为对手提供了口实。苏联对内的大俄罗斯民族主义政策和对外的大国沙文主义霸权,使其国内的非俄罗斯民族在社会主义民族平等的口号下感受到了帝俄时期民族压迫的阴影,使其控制的东欧国家和蒙古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旗帜下感受到具有殖民主义色彩的统治。因此,“少数民族的民族主义是对来自统治民族压迫的一种反应”^⑤,这一为历史上几乎所有帝国统治下的民族矛盾特点所证明的道理,也必然在苏联民族关系中反映出来;同时,“没有任何权威高于主权的、利己的民族国家”^⑥,这一为16世纪以来世界帝国兴衰历史所证明了的事实,也始终是苏联和东欧国家之间国际关系的矛盾焦点。

东欧国家除南斯拉夫外,基本上都是在苏联红军大反攻形势下获得解放的。战后东、西方冷战对抗格局的出现,使东欧成为苏联地缘政治势力范围严加控制的地区。从40年代末苏南关系破裂和南斯拉夫另辟蹊径建设社会主义开始,东欧国家一直没有放弃试图摆脱苏联模式的努力。被斯大林指责为以民族主义代替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南斯拉夫,虽然本身是一个民族关系极其复杂的多民族联邦国家,但是在40年代末的情报局事件后,由于苏联的军事威胁和经济制裁以及社会主义阵营的普遍谴责,被激发出抗拒苏联强权的国家民族主义。苏共二十大对社会主义阵营产生的强烈震动和铁托独立道路为苏联承认所产生的示范效应,使东欧国家谋求独立自主发展的愿望形成了摆脱苏联模式的变革风潮,在一系列具有抗苏特点的政治事件中,维护国家主权独立的爱国主义精神表现出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1956年匈牙利事件时,布达佩斯的学生、市民涌向爱国诗人裴多菲的塑像前,充满激情地朗诵这位诗人在1848年匈牙利民族反抗哈布斯堡王朝、争取民族独立斗争中写下的著名诗篇——《民族之歌》:“起来,匈牙利人,祖国在召唤!”“我们宣誓,我们不再继续作奴隶!”1968年波兰的“三月事件”,则以华沙民族剧院重新上演19世纪伟大爱国诗人亚当·密茨凯维奇的反俄诗剧《先人祭》拉开了序幕。人们借古喻今地发泄着对苏联强权的不满。当“布拉格之春”的变革开始启动时,第19届奥林匹克冬季运动会的冠、亚军决赛在捷克斯洛伐克队和苏联队之间激烈展开。捷克斯

① 埃·卡·唐科斯:《崩离析的帝国》,新华出版社,1982年,第271页。

② 布热津斯基:《竞赛方案》,第117页。

③ 尼克松:《1999——不战而胜》,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第157页。

④ 布热津斯基:《竞赛方案》,第226页。

⑤ 罗伯特·康奎斯特主编:《最后的帝国——民族问题与苏联的前途》,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22页。

⑥ 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世界知识出版社,1990年,第493页。

洛伐克队以 5:4 击败苏联队的消息一经传出,布拉格立刻成为沸腾的海洋。^①人们把在—项竞赛运动中所取得的对苏胜利视为民族自尊、自强、自立的标志,又何尝不是抗苏拒俄的民族主义的反映?东欧国家试图摆脱苏联控制的尝试,虽然在苏联的强权政治和军事干预下失败了,但是抵抗外来压力、维护民族尊严的民族主义意识却在社会生活中不断强化。所以,当戈尔巴乔夫到民主德国宣扬他的“新思维”和“公开性”时,隔绝德意志民族的“柏林墙”在民族统一的强烈意愿中轰然倒塌,东欧诸国的剧变也因此一发而不可收拾。长期被“俄化”、甚至连本民族文字都被用斯拉夫字母改造了的蒙古人民共和国,其反苏排俄的民族主义复兴运动也骤然兴起。苏联“大帝国”的崩溃也正是在苏联本土的内乱和势力范围内的剧变交互作用之下完成的。

东欧国家基本上都属于多民族国家,即便是民族相对单一的匈牙利、波兰、阿尔巴尼亚等国,也因其主体民族中一部分人属于其他国家的少数民族而存在着国际关系中的民族问题。战后东欧各国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社会主义原则,制定了解决民族问题的政策,并在一定时期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是,由于东欧国家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社会生活方面均程度不同地受制于苏联模式的影响,其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出现的失误和弊端也与苏联相类似,甚至连南斯拉夫也是如此。尤其是在过高估计社会主义建设进程和人为加速民族融合过程方面,在以阶级斗争方式处理民族问题方面,均表现出共同的特征。南斯拉夫建国以后即与苏联分道扬镳,铁托为了走出一条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道路,并急于证明这条道路的正确、有效且有别于苏联,从 50 年代初开始就对国家集权主义进行全面批判。南共认为,“国家中央集权制的政治经济结构本身同民族平等是不能并存的”,“集中制必然发展中央集权主义、霸权主义和民族不平等”。所以,随着加快“国家消亡”、党政分离和自治模式理论的实践,“南共认为她的最大和不可逾越的历史功绩是以创建联邦制的共同国家解决了民族问题”。^②自治和分权的实践成为业已实现民族平等的标志,也使取消联邦人民议会中的民族院成为必然。由于外来压力而形成的南斯拉夫各民族的一致性,在相当长时期内淡化和掩盖了国内的民族矛盾,南共把这种一致性视为各民族“一体化”的象征,也陷入了“民族问题已经解决”的误区。然而,在铁托的权威和“弱塞则南强”思想压抑下的大塞尔维亚民族主义,在联邦集聚财富重新分配给各共和国的机制中感到吃亏受损的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的民族主义,在自治、分权过程中要求更多自主权益的共和国和自治省的民族利己主义,都随着南斯拉夫的社会民主化、非官僚化和分权化过程中表现出的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和向一党制挑战等普遍的政治批判倾向而显现出来。所以,当 1964 年南共八大在建国近 20 年来首次公开指出民族问题尚未解决时,南斯拉夫的民族问题已经成为推动南联盟“邦联化”的重大动因之一。在那以后的频繁修宪、不断放权的过程几乎都是民族主义利己性的较量,民族主义的分离意识也由于各共和国和自治省之间民族性的对抗而在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以及科索沃形成了气候。在东欧剧变中,南斯拉夫在血与火的民族主义内战中一分为五,波黑则经历了 3 年多的民族仇杀、种族清洗和领土争夺的残酷内战。^③又如,70 年代初罗马尼亚在建设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社会和向共产主义迈进的

① 参见欧阳东:《东欧大裂变纪实》,中国经济出版社,1994年,第104、172页。

② 杜尚·比兰契奇:《南斯拉夫社会发展的思想和实践》(1945~1973),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80、174页。

③ 有关南斯拉夫的民族问题可参阅笔者主编的《南斯拉夫联邦解体中的民族危机》(四川民族出版社,1994年)和《旷日持久的波黑内战》(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5年)。

口号下,提出了“社会同质化”理论,即通过消除民族、脑体、工农、城乡差别来为进入“社会同质”的共产主义创造条件。为此,罗政府取消匈牙利民族的自治地方,关闭匈语、德语学校,在全国农村推行以罗马尼亚族民居庭院为标准的“规范化”运动,迫使“共居民族”同化于罗马尼亚族。这些措施不仅引起了少数民族大量外逃,而且加剧了匈牙利族的民族主义抗拒性。罗马尼亚1989年的政局骤变,导火索即是匈牙利族聚居地区的民众强烈抗议政府驱赶该地神父的示威活动。再如,保加利亚1971年制定了“建设发达社会主义”的新纲领,在加快发展经济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同时,以保加利亚是单一民族国家和不存在少数民族为由,对国内的土耳其族居民采取了同化政策,拆毁清真寺、停办土耳其语学校,甚至把土耳其族居民的姓名全部更改为保加利亚人的名字。这种举措迫使土耳其族居民大量外逃,由此而引起的社会动荡,为保国内的反对势力提供了政治演变的可乘之机。

东欧国家对国内少数民族的政策变化,始终影响着东欧国家之间的关系状况。例如,匈牙利政府对境外匈牙利人少数民族平等权利的关注,使匈罗之间、匈南之间、匈捷之间的外交争端时有发生。加之历史上遗留下来的领土问题,这种争端往往导致民族主义的发展。匈牙利的民族主义及其对境外匈牙利族人境遇的国际交涉,又引起匈牙利族人所在国家主体民族的大民族主义反应,加剧了该国对匈牙利民族的压制和防范,从而进一步激化了民族矛盾。这在匈牙利与罗马尼亚两国之间表现得尤为突出,甚至形成了恶性循环。而类似的问题在东欧国家之间普遍存在,如阿尔巴尼亚与南斯拉夫之间的科索沃问题亦是突出的一例。在政治演变和多党民主制的风潮中,民族主义政党林立,当然也包括了各少数民族的政治团体。民族政治多元化的发展,使前苏联、东欧地区各个多民族国家及其相互关系中的民族问题更加复杂,也使各民族要求分享国家权力、维护本民族利益的民族主义反应更加强烈。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联邦的重组过程是以各前自治共和国等自治实体纷纷升格为共和国为条件的。而车臣共和国拒绝加入联邦、要求国家独立和民族分离的运动,则以战争对抗和恐怖主义活动形成了俄罗斯国内最棘手的民族冲突“热点”。俄罗斯的日耳曼人要求重建“伏尔加河共和国”的呼声也未消停,并得到德国的支持;摩尔多瓦共和国的民族冲突,形成了“加告兹共和国”和“德涅斯特沿岸共和国”的民族分立状态,使俄罗斯和罗马尼亚不同程度地介入了摩尔多瓦的内政;乌克兰共和国的克里米亚地区要求建立“克里米亚共和国”,引起乌、俄之间的争端;格鲁吉亚共和国的前阿布哈兹自治共和国升格为共和国,要求独立,引起了激烈的武装冲突;南斯拉夫一分为五之后,新南斯拉夫联盟塞尔维亚共和国的科索沃地区宣布独立,成立了“科索沃共和国”,倾向于与阿尔巴尼亚合并或建立联邦,使南联盟如梗在喉;马其顿共和国境内的阿尔巴尼亚族也宣布成立“伊里里达自治共和国”,谋求建立“阿尔巴尼亚—马其顿联邦”;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共和国在三分天下的内战中,先后出现了“波黑塞尔维亚共和国”和“波黑克罗地亚共和国”,塞尔维亚、克罗地亚两国及一些伊斯兰国家均程度不同地介入了波黑内战。在联合国和美、英、法、德、俄五国的干预、斡旋下,波黑内战虽然休止,但是波黑国家重组的过程仍是一个未知数。与此同时,前苏联和东欧地区民族主义引起的国家裂变,使民族集团也进一步分化肢解。2500万俄罗斯人脱离民族母体而置身于以其他民族为主体的新独立国家之中;在前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地区,民族分化状况更加复杂。而新独立国家主体民族的民族主义所表现出来的民族复兴的激情又影响着国家的民族政策,使少数民族感受到大民族主义的压力,从而通过普遍的谋求自治方式来维护自身的权益。如波罗的海三国中俄罗斯族的自治运动;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南斯拉夫三国中匈牙利族的自治运动。这些民族自治要求毫无例外都得到其民

族母体国家的支持。1992年8月,匈牙利总理在布达佩斯召开的第三次世界匈牙利人代表大会上强调指出:“关心国外匈牙利族人是匈牙利宪法赋予匈政府的义务。”1995年,俄罗斯外交部长科济列夫甚至宣布,为了保护境外俄罗斯人的民族平等权利,俄政府不惜动用武力。民族矛盾的国际化使前苏联、东欧地区的国家关系趋于复杂,相应的领土争端、宗教矛盾、经济纠纷也呈多发状态。

第三次民族主义浪潮发端于苏联和东欧的政治演变,一些西方人曾因此而确认这股浪潮是瓦解共产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然而,他们未曾料到,在这股浪潮的影响下,西方国家乃至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民族矛盾、种族冲突、宗教纠纷、分离运动却日益加剧。这使第三次民族主义浪潮的表象特征更加完整,也使这股浪潮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内在实质更加清楚。比利时的佛位芒民族主义分离运动使这个王国成为联邦制国家;加拿大魁北克省的民族主义分离运动高潮迭起,1995年的全民公决仅以微弱的优势保持了加拿大的国家统一;继1992年洛杉矶种族冲突后,美国的种族矛盾日趋尖锐,1995年爆发了百万黑人进军华盛顿的大游行,1996年以来的白人种族主义焚毁黑人教堂的事件屡屡发生;德国以“光头党”为代表的新法西斯主义组织每年制造的种族排外事件数以千计;西欧种族主义回潮的现象十分普遍,很多极右势力政党在议会选举中地位上升;土耳其东南部的库尔德族分离主义运动,使土耳其政府屡派重兵镇压,甚至越境到伊拉克进行围剿;斯里兰卡泰米尔族的独立运动难以休止,恐怖活动、武装冲突不断升级;印度的教族冲突几乎遍及全国,宗教矛盾使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的克什米尔争端更加激烈;拉美国家中的土著印第安人争取民族平等权利的斗争,也以墨西哥恰帕斯州的印第安农民武装起义开启了新一轮的高潮;非洲大陆在多党民主制的风潮推动下,部族主义甚嚣尘上,很多国家陷入了部族冲突,布隆迪、卢望达的部族大仇杀为世人所震惊;地方分离主义在巴西、喀麦隆、意大利等国也形成气候,意大利北方联盟要求按捷克斯洛伐克方式与该国的中、南部分手;等等。这些事实清楚地表明,第三次民族主义浪潮是苏、美两个超级大国争夺世界霸权失败的产物,苏联的垮台、美国的霸权衰落使冷战格局压抑下的诸种矛盾爆发出来,而世界上仍普遍存在的民族、种族不平等现象使这股浪潮发生了传染性的蔓延。

通过对发端于前苏联和东欧地区的这股民族主义浪潮的分析和勾画,我们不难得出以下几点基本认识:

首先,“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是社会主义运动在探索中发展的失败的例证。其失败的要害是执政党没有始终如一地坚持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没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本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在实践中逐步背离了社会主义的原则,而把这一“模式”所造成的弊端当作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社会主义制度本身来加以批判和放弃,是苏联、东欧国家政治演变中所谓“人民的选择”所演出的一场现实悲剧。

其次,前苏联、东欧国家解决民族问题的失败,是背弃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社会主义民族平等原则和民族过程客观发展规律的结果。对内的大俄罗斯民族主义和对外的沙文主义政策,使国内非俄罗斯民族对社会主义民族平等原则失去了信心,使东欧国家对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失去了信任,因而产生的民族主义抗拒意识又促使苏联社会向大俄罗斯帝国转变和回归,并最终培植了拆散这个帝国的民族主义力量。

第三,发端于前苏联和东欧的这股民族主义浪潮在席卷苏联东欧地区之后,又向西欧乃至世界蔓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和世界各地固有的种族矛盾、民族矛盾在这股浪潮冲击下显著加剧,形成合流。当西方人士惊呼苏联、东欧地区民族主义的“潘朵拉魔盒”被打开时,却没有

料到这种“魔盒”也存在于自己的国家之中。包括西方发达国家在内的众多国家和地区之所以受到这股浪潮的显著影响,正是由于这些国家本身存在着“潘朵拉魔盒”。造就这种“魔盒”的力量,不是救世主的公正,而是自民族形成以来一直存在的民族压迫、种族歧视所依托的社会不平等。不论实行何种政治制度或主张何种意识形态,只要存在着事实上的民族压迫、种族歧视的不平等社会现象,就难免不在这股跨国界的浪潮冲击下暴露出内在矛盾和冲突。

第四,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曾一度使西方势力弹冠相庆,认为共产主义已经大失败,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已取得了“不战而胜”的胜利,并且预言所有的社会主义多民族国家都将步苏联的后尘,等等。然而,他们不仅没有料到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出现的种族主义回潮、极右势力上升、分离运动加剧和民族冲突频仍等问题,而且也没有料到像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多民族国家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中所展现出的政治稳定、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民族团结的国家形势。马克思主义并没有失灵,社会主义并未终结。邓小平同志在46年前指出:“在世界上,马列主义是能够解决民族问题的。在中国,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也是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的。”^①这一论断并未因前苏联和东欧国家解决民族问题的失败而失真,因为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并没有始终如一地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论断对于中国民族问题的解决程度来说,则是实实在在的。

最后,苏联、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联邦国家的解体,使前苏联、东欧地区的国家增加了20余个。民族主义的国家裂变基于建立独立自主的民族国家的强烈愿望,然而力求划清“你”和“我”界限的民族国家的重组,事实上并没有改变前苏联、东欧地区多民族国家的格局。俄罗斯联邦自不待言,前苏联的其他加盟共和国独立之后依然是多民族国家,包括前南地区出现的5国和捷克、斯洛伐克都是如此,这些国家都面临着如何正确处理和科学解决民族问题的任务。像斯洛伐克独立后试图通过重新进行行政区划来对匈牙利民族聚居区“分而治之”的措施,遭到匈牙利族人及其政党势力的坚决反对,并进而导致提出建立全国性的匈牙利族自治区和在凡有匈牙利族居民的村镇均建立自治组织的要求。斯洛伐克政府的这一举措不仅加剧了国内的民族矛盾,而且引起了匈牙利和斯洛伐克两国之间的外交争端。类似的问题在前苏联、东欧地区新独立国家中普遍存在,它直接关系到这些国家内政的稳定和对外关系的发展。因此克服主体民族的民族主义,建立和睦共处的族际关系,避免重蹈民族问题危机的覆辙,或早或晚都将成为这些多民族国家的必然选择。在这种选择中,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作为科学阐释民族过程发展规律和正确解决民族问题的思想武器以及依据这一理论取得成功的实践经验,重新被认识、吸收、借鉴也将是必然的。“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②

① 邓小平:《关于西南少数民族问题》,载《邓小平文选》,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63页。

② 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载《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82页。